

古田会议召开前——

中央“九月来信”来龙去脉

■褚 银

记 史

1929年12月28日,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万源祠,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这就是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可见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提供了指导依据,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初创时期的红军成分复杂,主要是农民和旧军人。他们虽然已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存在的小私有者和旧军队的烙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怎样把这样一支杂乱的部队,建设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实践中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解决的重大问题。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会师后,合编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5军主力转战到井冈山同红4军会合。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振奋了军威士气,增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

伴随着井冈山残酷的斗争,这支部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影响最大的一支红军部队。

二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恩来在险象环生、敌特遍地的环境下,以他的冷静和机智,指导各地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时刻关注着远在罗霄山脉的红4军的最新动向。中共中央几次派人送信给红4军,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4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但从各种渠道汇集的消息来看,红4军的确处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中。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4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会剿”,于1月中旬离开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听取中央军委部长杨殷关于红4军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做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

目标,调毛泽东、朱德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替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起草的。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二月来信”由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携带赴江西寻找红4军。几经辗转,当毛泽东、朱德见到这封信时已是4月3日。此前的2月,红4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这个大胜仗,扭转了红4军原来的被动局面。紧接着,又在吉安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胜利会合,在这里站住了脚跟。而中央的指示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4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显得很不同。

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红4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还全面分析了南方数省的革命形势,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复信还详细总结了红4军采取的游击战术。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4月4日(也就是红4军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4军问题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7日,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致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说,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关于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只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调朱、毛出来的事情,实际上就此作罢。

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4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会上,周恩来表示,中央2月7日的信所谈的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他说:目前的形势,全国的混战期是延长的,这于红军的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现在很需要朱、毛

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对其他处红军,军事会议也应详加讨论。

三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红军的发展,1929年春夏之交,红4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一些同志所接受,甚至在红4军“七大”被越权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4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员送来的红4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从这些信件的内容,周恩来敏锐地发现,红4军内部的争论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4军问题。会上,周恩来在讨论红4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时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做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

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八月来信”)。周恩来依据所得到的材料,初步对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争论,作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建党建军主张,并对一些主要的错误思想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指示信还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

在中央指示信发出的第5天,陈毅抵达上海。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口头汇报,两人作了多次长谈。特别是在阅读了陈毅的“五万言报告书”后,周恩来对红4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加深入完整的了解。在他看来,8月21日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显然不足以解决红4军的问题,重新起草一封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迫在眉睫。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4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并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对红4军的指示信。三人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深入分析问题症结,努力探求解决之道,最终形成统一的意见。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

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

这封近万字的指示信分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9个部分。指示信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指示信还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责成前委“须使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就为红4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三人委员会集体研究,经周恩来审定修改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随后,周恩来又叮嘱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四

参加完全国军事会议之后,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带着重要指示,长途跋涉,披星戴月,重返红4军。10月22日,陈毅在松源和朱德见面,原原本本地详尽介绍了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4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召开的前委会议上,陈毅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即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2月28日至29日,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举行。这是红4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4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图文军史馆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顶早已褪色的军帽,它的主人是蒙古族骑兵连长——拉玛扎布。

抗日战争胜利后,拉玛扎布参加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不久调任乌兰浩特东蒙古军政干部学校队长。1947年初,他被选派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任师作战参谋、侦察参谋等职;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调任骑兵第1师第2团第3连连长。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骑兵第1师、第2师参加了辽沈战役。第1师主力奉命沿北宁铁路两侧和绕阳河两岸进行运动防御,并执行战役侦察任务。10月15日,锦州解放。蒋介石仍命“西进兵团”由彰武等地经黑山、大虎山向南,在“东进兵团”的策应下夺回锦州,然后掩护沈阳守军经北宁铁路撤入关内。此时,中共中央军委部署了规模巨大的辽西围歼战;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第10纵队等部阻击“西进兵团”,为攻锦部队回师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展开辽西围歼战赢得时间。

骑兵第1师奉命进入胡家窝棚前沿阵地,拉玛扎布所在的第2团接到命令:袭击国民党军骑兵先头部队,迟滞国民党军前进,保证我军主阵地的安全。接到命令后,第2团指战员从胡家窝棚向田家窝棚方向疾速前进。当获知田家窝棚只驻扎着敌军1个前哨连时,拉玛扎布决定对守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我军全歼敌军前哨连。田家窝棚战斗的胜利,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有力保障了我军大虎山主阵地的侧翼安全。

田家窝棚战斗刚结束,第2团又接到命令:到大虎山车站以南的清水泡子村配合步兵完成阻击任务。拉玛扎布带领骑兵第3连赶到清水泡子村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来犯的国民党军。10月24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向大虎山进攻,企图占领大虎山,掩护“西进兵团”主力向营口逃窜。

拉玛扎布带领连队官兵坚守在清水泡子阵地,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冲锋。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便暂时停止进攻,构筑临时工事,准备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为遏制国民党军的进攻,上级命令骑兵第3连从国民党军左侧实施勇猛快速的冲锋,削弱敌人的攻势。接到命令后,拉玛扎布带领连队官兵冲向国民党军。

正在疯狂进攻的国民党军万万没有想到,在枪林弹雨下,我军骑兵会反冲锋。敌军猝不及防,慌忙后撤。但是大部分国民党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就地卧倒,向我军进行猛烈射击,妄图阻拦我军的冲锋。拉玛扎布和战友没有畏惧。他看到敌人的机枪还在喷吐火舌,对我骑兵造成很大威胁,便毅

骑兵连长血洒敌阵

■李梦璐

然向重机枪火力点冲去。当冲到距离国民党军火力点约30米处时,拉玛扎布的坐骑中弹倒下。拉玛扎布猛地被掀下马来,他拔出手榴弹甩向国民党军。伴随着爆炸声,拉玛扎布一手挥刀、一手握着手榴弹又向前冲去。一阵枪声袭来,拉玛扎布胸前多处中弹,一腔热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骑兵第3连的战士见连长牺牲了,更加拼死战斗,冲垮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战后,内蒙古军区为拉玛扎布追记战斗三大功,并授予“人民烈士”的光荣称号。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曾伴随拉玛扎布出生入死的军帽每天在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这位蒙古族骑兵连长为了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骑兵连长拉玛扎布的军帽。
辽沈战役纪念馆供图
图片制作:周永昊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长征

第6239期

上海战役中的一次大捷——

高桥争夺战

■姚彬彬

高桥位于浦东最北端,是扼守长江和吴淞口的咽喉之地,也是敌人的防御重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

由于高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河流纵横交错,公路、桥梁大都被国民党军破坏,加之当时正是雨季,道路泥泞,大口径火炮跟不上,弹药输送、物资补给和伤员转运都遇到很大困难,部队行进缓慢。而国民党军依托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防御阵地和大量土木工事,凭借高桥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在海空军配合下,以优势炮火与我军在高桥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9日,我第30军接到其第90师报告,第268团、第269团从高桥正南突入敌人阵地,攻占了严家桥等地。高桥守军在飞机、炮舰支援下,向我严家桥阵地反扑。第269团利用工事顽强抵抗,连续7次打退敌人的反扑。第268团会同第269团攻克严家桥阵地后,乘胜向杨家楼攻击。此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并出动坦克实施反击,使第268团被迫退回到严家桥一线。第270团向严家桥一线增援的途中,遭遇敌机和舰炮压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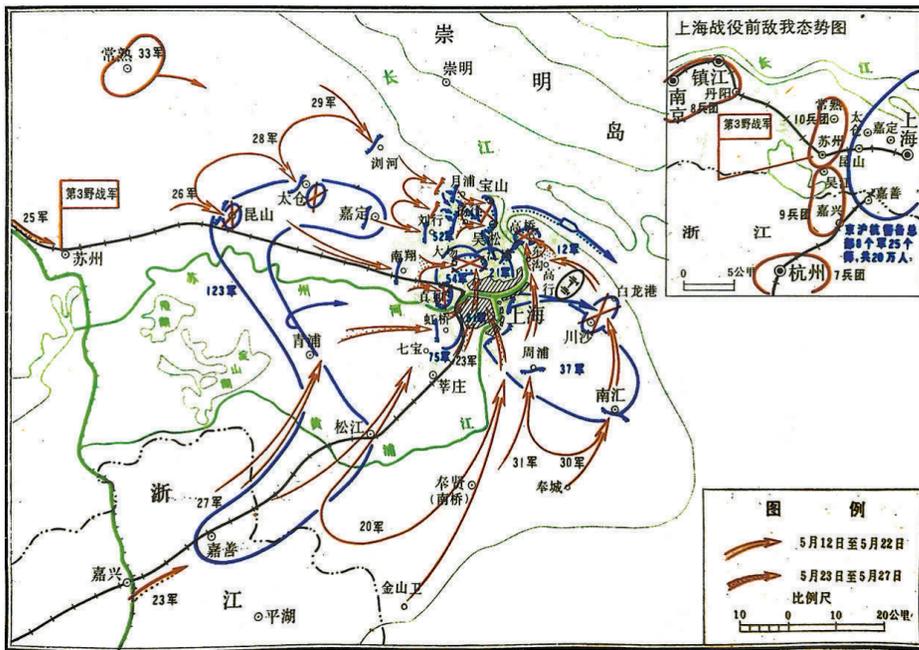
队进攻受阻,与敌人形成相互争夺局面。20日,敌人又以飞机、舰炮大肆袭击第30军新占领的益家桥、徐家宅等地,欲乘我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夺回阵地。我军指战员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21日至23日,高桥敌守军依靠地形、工事、火力等优势,向我军阵地发起连续攻击。面对不断增多的敌人,我军因弹药补给不足,火力不能完全压制敌人,阵地多处被突破。但我军全体指战员在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后,攻克了顾家宅等多处据点。

22日,汤恩伯见反扑收效甚微,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而且损兵折将,高桥守军逐渐不支,于是紧急命令第75军增援高桥,保护海上撤退道路。22日至23日,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动多次反扑,我全体指战员英勇抗击,守住了阵地。

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巩固了我在高桥外围的主要阵地,为攻克高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3日夜,第3野战军随即命令上海守敌发起总攻。

第31军同第30军有关人员,就高桥



作战召开战前会议,确定“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接打高桥”的作战策略,对高桥守敌形成包围态势。

经过精心组织和严密部署,25日,我军对高桥守敌实施炮火攻击,摧毁守敌的火力点,随即发起总攻。

26日,高桥守敌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一部被歼,大部仓皇向三岔港方向逃窜。我军迅速追击,歼灭逃敌,将三岔港之敌全部歼灭,胜利完成了封锁黄浦江出海口的任务。

此战,全歼高桥地区守军,俘5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封锁了黄浦江口,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打通了通往上海市区的前进道路,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图:上海战役经过要图(1949年5月12日—27日)。 资料图片